

诚信原则与中华伦理背景

苏亦工

[摘要] 本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方法,对当代各国民商法领域普遍接受和适用的指导性原则——“诚信”在中国适用的伦理基础加以考察。作者指出,尽管传统伦理学说中“诚”、“信”为引入“诚信原则”奠定了价值取向的基础,但二者也有严重不相适应的一面。由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欠,中国社会的诚信水平远未达到理想标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适当调整,树立政府行为的诚信,方能使该原则起到维护法制、促进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 诚信原则 中华伦理 背景

诚实信用是当代各国民商法领域普遍接受和适用的一项指导性原则。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为满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之需要,顺应现代民法发展潮流,于第4条中正式采纳了这一原则,且作为统摄一切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举措的确颇具远见。如能针对我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背景善而用之,必将对推动我国的法制和市场经济建设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如果囫圇吞枣,生搬硬套,则仍不过是一纸空文,徒滋装饰而已。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愚见所及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词义比较

“诚”、“信”二字古义相通,可以互训。信的本义是真实无欺。《说文》:“信,诚也,从人言。”段注谓:“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言必由衷之意。”^①《左传·宣公二年》:“弑君之命,不信。”^②“信用”两字合用古语则常作动词。《左传·宣公十二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此处的“信用”即有信任、使用之意,与晚近的名词用法有出入。诚的本义也是真实。《说文》:“诚,信也。从言成声。”《易·乾》:“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疏》:“诚谓诚实也。”《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礼之径也。”《疏》:“诚谓诚信也。”诚实两字联用古义有二:一为忠诚老实,《旧唐书》卷101《韩思复传》:“特此诚实,以答休咎”;另义为确实,《后汉书》卷68《鄧太传》:“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刘淇《助字辨略》说:“诚实,重言也。”^③诚信连用:《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

① 本文所引《说文》均据《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本文所引《左传》及其它经书均据《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页。

于克诚。”《礼记》：“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由上可见，“诚”、“信”在中文中的基本含义是真实可信，其反义词是虚假、欺骗、矫饰。

从字面上看“诚实信用”并不费解，但作为专用法律术语就比较复杂了。如果我们不讳言我们的现行民法法源，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在适用和解释各项术语时，就不能不考虑其在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确切含义。

“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 Treu und Glauben，法语作 bonne foi，均与拉丁文 bonafides 有某些渊源关系^①。德国人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②英美法中的 good faith，近来多译为“善意”。但查《牛津法律大词典》中 bona fides 一条加括号（good faith），显然是将二者视为对应词^③。其释文说：“任何人诚实行事，不知道也无理由相信自己的主张不正当时，即是 bona fides 的行为。”另条解释 Good faith 则说：“诚实的行为，纵有过失，仍属 good faith 的行为。”两条中“诚实”一词的原文均是 honest (ly)，其基本含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能是谎言或欺骗；直率的，不隐瞒事实。可见无论 bona fides 还是 good faith 如译作诚信似更近原义。如译作“善意”则可能引起误解，在不对照原文的情况下也许会令人以其与法、德民法中的“诚信”——这一长期以来固定的汉译术语非指一事。

西方（包括大陆法和英美法）权威人士认为，确切界定“诚信”原则的法律含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该原则除“诚实可信”的字面含义外，常常有附加的含义，以致“适用该原则的合理性，只有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才能确定”^④。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1-201 条第(19)款规定诚信(good faith)的含义是：在“有关行为或交易中事实上的诚实(honesty)”。该法典《正式评论》解释说：“无论本法典何时使用‘诚信’一词，至少具有这里所阐明的含义。在某些章节中，由特定条款提出附加要求者应予适用。”例如在针对买卖合同的第 2-103(1)(b)款中规定：“在涉及商人的情况下”，应包括“遵守同行中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第 1-203 条则规定：“凡本法范围内之任何合同或义务均要求(当事人)必须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正式评论》解释该条的目的时说：“本条确立了一个贯穿全法典的基本原则，即在商业交易中，要求所有的协议或义务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⑤此条的精神与《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 231 条规定相似，后者规定：每项合同加诸各方当事人以在履行及执行合同时诚信和公平交易之义务。美国学者提出的“反向解释”方法颇为实用^⑥，可兹参照。

通过以上的比较，似可指出：中文“诚”、“信”与西方对应词的字面意思相近，但不具备西方法律语言中的特定或引申的含义。另外，“信用”不可作狭义的理解。《日本民法典》译作“信义”^⑦，避免了类似的误解，且保留了更广阔的引申余地，似较译作“信用”为佳。迄今

① 参见陈瑾昆：《民法通义债编·总论》，北平朝阳学院 1933 年版，第 202 页。

② ④ 见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8、150 页。

③ 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Clarendon Pr. 1980.

⑤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分见 Commercial and Debtor-Creditor Law, The Foundation Press 1993 年，第 18、23 页。

⑥ John E. Murray, Jr., Cases and Materials of Contract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6, pp- 632- 33.

⑦ 《模范六法全书》，三省堂，昭和 32 年版。

为止,我国尚无有权解释对该原则作出明确的词义界定,适用和解释时应特别审慎。

二、伦理意义

诚信原则来源于道德准则是中外学界所公认的了^①,无庸赘言。然而它所依据的道德体系显然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无独有偶,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碰巧也有相似的准则。问题是这种相似仅仅是字面上的巧合呢还是内涵的一致?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实践中难免不望文生义、张冠李戴。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中国伦理体系与之相依托,该原则能否在中国完全推行未尝不是一个疑问。

“诚”、“信”纳入中国传统伦理的范畴应归功于先秦儒家。孔子至少从五个角度讨论过“信”。首先,孔子把信看作自己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子路问孔子本人的志向时,孔子答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②其次,孔子把信看作人人都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𡗗,小车无𡗗,其何以行之哉。”^③在他看来,人缺乏信,就好比车子不装𡗗、𡗗一样寸步难行。因此,当子张问他如何“崇德”时,孔子说:“主忠信,徙义。”^④其三,孔子将信视为人生求学的前提和基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⑤其四,信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⑥其五,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换言之,即信是政府行为或国家行为的准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⑦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答曰:“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⑧按:此句中的“信之”、“信”,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均解为人民对政府单方面的信心。而从全句特别是后一个信字看,参之《子路》篇“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似依朱熹的解释更通顺。朱熹说:“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⑩

孔子以后的思孟学派,在“信”的基础上发展了“诚”。在《论语》中“信”有两种用法:一为诚实无欺,“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是;一为相信、信任,“听其言而信其行”,“朋友信之”,是。而《大学》、《中庸》、《孟子》中言“信”多为后一种用法,前一种用法则多用“诚”字代之。《孟子·离娄上》:“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从这段话中即可看出“诚”与“信”字义上的细微差别。“诚”强调内心的真实,是主观的、主动的;而信则倾向于外在的行为,是客观的、被动的,故

① 参见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论语·公冶长》。

③ 《论语·为政》。

④ ⑨ 《论语·颜渊》。

⑤ ⑦⑧ 《论语·学而》。

⑩ 《论语集注》卷6,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页。

诚为信的基础。现代汉语中,诚实和信用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差别。孔子谈论信,常混而用之。而思孟学派则特别突出信的第一种用法——“诚”。前面说思孟发展了孔子的“信”,即指此而言。《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里所说的“诚”,似乎已脱离了伦理的范畴,而是万物的主宰,因而被现代批评家们斥为唯心主义。依笔者愚见,思孟所说的诚,仍然是在讨论人际关系问题。之所以要将“诚”说成是“天之道”,未必是真的要探讨宇宙的本体,未必是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而无非是要让人们相信,“诚”作为“人之道”的当然和合理。前引孟子语亦见于《中庸》(略有不同)。宋人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天所谓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①这段话,不妨视为对前引孟子语的诠释。说了半天“天”,最终还是落在“人”上,目的是要人相信“君子诚之为贵”。须要注意的是,这里孟子所强调的“获于上有道”、“信于友有道”、“悦亲有道”、“诚身有道”,仍未能算“诚其身”及张载所谓“不已于仁孝”,都是想说明,仅仅是行为上客观地、被动地遵守行为准则还是不够的,还要在主观上,主动地“明乎善”的道理,才能做到“至诚不动”。孟子把仁义礼智视为人性所固有。《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不提“信”,并不是“信”在思孟学说中没有地位而是因为有了“诚”,“信”就是“诚”^②。蔡元培先生认为思孟的“诚”就是孔子学说中的“仁”^③,至少单从二者在各自学说中的地位看,这种比喻是不错的。

除儒家外,法家巨擘商鞅也特别强调“信”^④。不过他所说的“信”是一种治国的策略或手段,不是伦理意义上的。

汉儒将“信”列入五伦,成为官定的支配伦理准则。自是以后,历代的“圣君”、“名臣”、“贤哲”、“硕儒”无不标榜“信”,民间更是赞美“信”。从以上这些分析看,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与西人是基本一致的。更令人兴奋的是,中国人对“诚”、“信”的崇尚决不弱于西人;“诚”、“信”有儒家伦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并不低于其在基督教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说,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的“诚”、“信”为引入“诚信原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上文说传统伦理学说中的“诚”、“信”为引入“诚信原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指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这是从宏观意义上说的。要想使之成为民法“诚信原则”所依据的道德准则,绝不可忽视其不适应的一面:

其一,现代民法中的诚信,是一种法律化的商业道德^⑤(或称行业道德),而非泛泛的社会道理,具有较强的限定性,注重客观和应用。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诚”、“信”,理想的色彩大于实用且基本上属于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不宜直接作为商业伦理,更不宜固定为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前述孔子从五个方面阐述“信”的意义,有四项属于人生道德范畴,第五项则是政治伦理。思孟所说的“诚”,与其说是人生伦理不如说是人生理想。后儒将

①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0页。

② 杨向奎:《论仁》,见王俊才、秦进才编:《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

③ 参见《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商君书·修权》。据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页。

⑤ 按:这里所说的“商业”泛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任何经营领域,包括医药、律师等行业在内,非指狭义的交易领域的商业。

“诚”作为“君子”修身的目标而不列入“五常”大概就是意识到它过于抽象、玄虚,非普通人所能企及。冯友兰先生指出,儒家的非功利主义使其学说常常只注意行为的正当与否而不问结果^①。所以孔子一生行事往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传统的这个特点至今仍有影响。譬如我们宣传某个先进人物,总是要把他(她)描绘成道德完人。如果仅仅是弘扬某种理想,那当然很好;但要作为法律所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就未免不太现实,也缺乏可行性。诚信原则所依托的道德准则,必须是人人可能做到的,而非高不可攀的。我们很难指望商人皆成雷锋,只要符合法律所要求的起码的行业道德标准即可。

其二,西方社会商业发达较久,其道德伦理受基督教影响,适用于较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则植根于宗法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受儒家“爱分等差”思想的影响,涵盖的范围大都比较狭窄,一般仅适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即后世所谓五伦。在先秦儒家眼里,“信”也许还不限于“朋友”尚能推及于“国人”,《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但到了后儒那里,“信”则日趋狭隘和庸俗,基本上成为局限于朋友或熟人之间的伦理准则。清人刘宝楠说:“五伦之义,朋友主信。”^②至于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在传统伦理学说中几乎是一个空白。遗憾的是,此种缺欠至今尚未弥补,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周围情形就不难看到,陌生人间相处常常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讲,这与我们礼仪之邦的美誉真是大相径庭。在美国的时候,我曾注意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相互熟悉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常常相互大笔借钱,少的一两千,多则上万美金,但极少听到有赖帐不还的事发生。这种情形在美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美国人私人之间,即便是亲朋好友也极少有相互大笔借钱的事。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向他认为是至交的美国朋友借钱,得到的回答是“这事你应找银行帮忙”。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如果你的车半路抛锚,找不认识的中国人帮忙,常常是自讨没趣,而美国人(同样是不认识的)则可能主动援手。有位西方人曾经这样写道:“儒家所理解的人性和社会与基督教传统下所理解的截然对立。后者认为,每个人对其他的每个人均负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因为所有人都分享着共同的人性。隐含在这种观点之后的理念是:每个个体都有灵魂并因而具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儒家社会缺乏这种抽象的社会责任观念。它们的责任是具体的,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③

当前我们正在搞市场经济,传统的、封闭的,以血缘、地缘、人情为纽带的“小圈子”伦理体系必将为社会化的、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间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所取代。比较而言,传统伦理范畴中的“信”,具备一定的条件,它既是中国人民所熟悉和长期认可的价值标准,同时又具有改造和扩充的余地。如能针对上述不足加以调整,必能维护法制、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

① 《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104页。

② 《论语正义》,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册,第6页。

③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5, p 15.

三、实践背景

以上对现代民法原则“诚信”及与之对应的我国传统伦理背景的分析主要是理论上的。至于“诚”、“信”在我国传统道德实践领域的情形究竟如何则应另当别论。

大约一百年前,一位名叫亚瑟·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积 22 年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写了一部专门讨论中国人性格特征的书——《中国人气质》^①。该书专章讨论中国人“缺乏信”的问题。在被视为该书总纲的第一章中,作者阐述了他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看法:“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客观地说,史氏的看法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警醒:

其一,我们在理论上推崇“信”并不意味着该道德准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认真的遵行。特别是在商业领域,该准则非但奉行不力甚至可以说是遭到了公然的践踏。清代的一份生意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商人对“诚信”的态度:“生意不比古时,以老为实,彬斌板版,目令你者依古时做生意者,则鬼已没得上门,而时下须得言如胶漆,口若蜜罐,花描行事,……但今世俗只宜假,不宜口(真?——笔者)。又道:一天卖得三石假,三天卖不得一石真。”按:据介绍,此件系 1994 年从一日本人处抄得。专家鉴定其“显然为山西商人所著”,并推定其系在乾隆年间江苏人王秉元纂《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②。

类似的实例至今包围着我们。远的不谈,单从当前的市场道德水平来看就令人无法乐观。假货满天飞,劣货到处是,这些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其二,史氏认为:“中国不缺乏各种人才,然而缺乏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相互信任,缺乏这些要素,帝国是不能复兴的。”^③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不也是在讲同一道德吗?

另一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卜航济这样写到:“抽象地说,中国人都主张诚实,但同时那些劳工阶层却要靠小聪明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一个人被称为好人,那就意味此人非常老实,但同时也有点傻,不够精明。”^④看来,从理论上讲我们都不反对诚信,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往往把握不住。中国法律自汉以来实现了所谓“礼法融合”,即将儒家的道德原则纳入法律。君主专制和家族统治得以推行两千余年,离开了传统法律对所谓“忠”、“孝”的硬性保护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信”作为儒家五伦之一,却未能成为法律化的道德准则。尽管先儒倡导“诚”、“信”两千多年,可效果至今仍不理想,这方面的症结不可小视。

从现代各国民商法发展趋势看,诚信原则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适用的范围也日渐广泛,说明各国都在有意识地借助法律手段维护商业道德,以期确保市场运行的规范和有序。这似乎告诉我们,现代文明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强调精神的文明,这既为人类道德发挥作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又对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提出了紧迫的要求。199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制度既包括正规的体系诸如(下转第 58 页)

①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③均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附录二,“贸易须知”,第 342—343、335 页。

④ 《卜航济自述》,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 6 辑,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8 页。

法见不会长期地与立法与行政部门的主要看法背道而驰”。^⑤因此,最高法院对“弹性条款”的适用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弹性条款”的适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在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的作用的发挥,全靠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如果不对宪法予以适用,它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此,要树立宪法的权威,要加强法制建设,就必须加强宪法的实施。其次,就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因此调整各种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宪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毫无疑问是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充分发挥宪法的经济功能不仅是适当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责任编辑 何柏生)

(上接第 51 页)宪法、法律、保险和市场规则等,也包括非正规的行为准则,诸如习俗、道德、伦理等。它们构成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经济和政治体制运转的好坏。“如果针对盗窃没有基本的伦理上的、宗教上的乃至文化上的惩罚,我们的刑法未免负担过巨而难于推行”^⑥。法律和道德的相互维系就是如此紧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我国社会拥有长期的人治传统,最高统治者个人以及整个统治集团的道德水平具有超乎寻常的示范作用。先儒注重“信”的政治伦理意义,法家强调政府行为必须“信”,都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现实提出的,绝非无的放矢地描述某种理想境界。它既是治疗中国社会缺乏信的药方,又道出了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林语堂曾经指出:“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们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⑦现在我们有了一部真正的宪法,我们已经有勇气承认我们党政官员中可能混杂着败类。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要特别警惕那种‘口言善而行恶’的人”^⑧。这不仅表明了他本人对待腐败问题的态度,也表明了党和政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诚信”的诚心和决心。

(本文责任编辑 何柏生)

⑤ [美]加里·沃塞曼著:《美国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1 页。

⑥ Gerry Everding, Douglass North Prizes Economic History, REcords(Wash. U.), Oct. 21, 1993.

⑦ 《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0 页“仁政”。

⑧ 《生活文摘报》1997 年 4 月 9 日。